

# 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 美国南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变

王 欣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作为美国文学史研究上重要的学术话语,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之间话语模式的嬗变凸现了美国南方知识分子的政治策略。基于南方内战创伤记忆,南方知识分子提倡重农主义思想和相应的生活方式,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对社会的侵袭,反对现代化和城市化对传统文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重农主义话语的政治诉求在其文学话语中得到体现,并进而表现为新批评的政治理想。新批评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束缚,可以独立存在的审美经验,并通过学术机构的生产和推广,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富有教化功能的话语。这场话语演变蕴含着南方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诉求,反驳了新批评缺乏历史维度、忽略社会和政治因素等指责。

**关键词:**美国南方;创伤记忆;政治诉求;重农主义;新批评

**中图分类号:**I71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6-0111-06

从学术史的层面研究特定时期话语的形成和演变是当前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研究内容包括话语的建构和接受、学术机构对话语的体制化、各话语领域的交流互通等方面。作为美国文学史研究上重要的学术话语,重农主义到新批评之间话语模式的嬗变凸现了美国南方知识分子的政治策略。20 世纪 20 年代到 20 世纪中叶,以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 C. Ransom)、艾伦·泰特(Allen Tate)、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为首的南方知识分子,从重农主义者转变成为新批评理论的倡导者,他们的话语参与了社会能量的循环,通过南北意识形态对抗、新南方主义和进步运动、凯恩斯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美国大学教育改革、麦卡锡主义等话语链上的流通,推崇文学的本体地位,使文学独立于政治经济,成为知识分子追求和谐统一的政治诉求在现实中的投影,从而消减了社会矛盾,维护了

国家权力。50 年代之后,新批评的发展势头逐渐衰落。众多对新批评的研究本着整体化理解的出发点,忽略新批评话语演变中的政治诉求,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新批评具有“明显的狭隘性、保守性、片面性、孤立研究文学文本形式、结构的极端形式主义”,其结论是新批评“无法解答一系列文学的重大问题,最终导致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sup>[1][24]</sup>。应该说,对新批评的批评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失之偏颇。这种批评同样出自一种狭隘的历史主义观点,它没有从话语演变的角度看待新批评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从社会文化的语境来评价重农主义话语和新批评之间的联系。

## 一 创伤记忆和重农主义者的政治诉求

20 世纪初,美国南方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新世纪,还有一份先辈留下的遗产:对传统的尊崇和对过去的记忆,以及由于战败而产生的疏离感。美国内战不

**收稿日期:**2012-08-2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编号:11YJC52029)、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编号:skqx201103)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欣(1971—),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香港大学、美国弗吉利亚大学访问学者。

仅是政治上两种观念的较量或是经济制度的抗衡,而且是两种意识形态观念之争,即北方的资本主义所宣扬的个人主义、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北方人所崇尚的自我约束、生活俭朴、努力工作的生活方式和南方的贵族主义、闲散的生活方式、密切的家庭联系等之间的斗争。即使进入了20世纪,遭遇了内战挫败的幸存者及其后代们,仍然生活在创伤的阴影中,南北之间的文化冲突还在继续。在这种独特的创伤文化语境中,老南方的文化意象成为一种抑制过去的创伤、忘记伤痛、恢复社会秩序的记忆策略。南方记忆通过反复重写,创造出老南方、南方传奇、南方伊甸园神话等文化意象,将一种文化的想象加诸萦绕着历史创伤的现实上,期冀通过老南方意象中一些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如荣誉、勇气、骑士精神、忍耐、仁慈、博爱等)所具有的永恒性和历史超越性,来对比南方内战及其之后带来的变化。

1929年,以兰色姆为首的“十二个南方人”,发表了《我要坚持我的立场:南方和农业传统》(*I'll Take My Stand: The South and the Agrarian Tradition*),被视为南方对过去的一次回顾。这一群南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正在腐蚀南方,因此南方应该回到其传统农业文明中,回到和土地相连的生活方式,以便于建立和谐有机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才能孕育出优秀的文化和艺术。这本论文集被称为重农主义宣言,由此所诞生的重农主义运动是南方神话和现实之间张力的产物。它体现了“农场和庄园的拥护者”、“观念和现实”<sup>[2]85</sup>之间两种话语冲突,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奴隶制的对立,以及在社会文化领域里现代化与老南方神话的对立。在这条二元对立的话语链上,前一项通常对应着科学实证主义、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后一项则对应着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重农主义者的策略是沿用南方文化代码,用后一项的关键词如传统、和谐、家庭、宗教等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进而对抗北方工业资本主义。

重农主义话语并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政治经济纲领,但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农业社会等同于一个信仰宗教的,传统的,有审美情趣的生活”<sup>[3]45</sup>。也就是说,重农主义话语的政治理想可以表现为一个传统社会的意象,而这个意象可以通过文学审美得到解释和表达。这种政治、社会话语和文学话语的相通及互换,肯定了文学的政治力量,使文学的独立自主、完美和谐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从这种社会话语互换的角度出发,他们对工业社会的抨击体现为对科学现代化的怀疑,进而在新批评阶段表现为对科学实证主义的否定。

重农主义话语事实上已经展露出新批评一些基本的理论基调,在他们对北方的抨击中,隐含着整体论和有机论的观点。兰色姆等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割裂了理性和感性,否认个体情感和感悟力,破坏了传统的和谐。而现代工业滋生出来的科学实证主义则剥离了物与价值,从而使整个社会也倾向于机械化。泰特使用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在一匹马面前,传统社会关心的是“整匹马”或马的“图像”(icon),但科学实证主义看到的不是马的整体,而仅仅看到它的抽象价值,即“马力”(horsepower)<sup>[4]245</sup>。兰色姆进而指出,“科学不是通过驳斥,而是通过抽象化来破坏意象的”<sup>[5]195</sup>。重农主义者认为,科学话语提前预设实证或经验数据的所指,而文学话语则聚焦于语言的喻指,通过检测语言的物质性和生产性以便识别理性话语的可能性和局限。因此,文学生产出与科学话语不同的知识对象,它不为一种抽象意义或用法而定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对个人的分裂、对人的异化,重农主义话语所赞美的传统南方形象代表了有机统一的理想社会模式;从社会意义上讲,也有助于消减历史创伤的伤痛和挫折感。

重农主义者对传统消失的焦虑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而加深。他们认为市场限制了个人选择和行为的范畴,将个人简单地定义为生产者或消费者,进而使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经济交换。新南方教条和进步主义逐渐将南方推向市场化,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交换关系和现金关系。他们看到,美国公众“视作家为一个商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类型,并且依据作家的收入来表达相应的尊敬”<sup>[6]48</sup>。重农主义者自身也经历了被市场化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出版商成群涌入查铺山(Chapel Hill)和纳什维尔(Nashville),寻找南方作家以满足北方人的阅读兴趣。泰特、兰色姆、沃伦、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等都迫于经济压力,同出版商签订了合同。戴维森于1929年承认:“没有人能拒绝出版商,他们像地里饥饿的猎狗,搜寻着南方作家,至少就有三个出版商在我背后追逐着我。”<sup>[7]22</sup>泰特则苦涩地描绘了美国社会中作家的地位,他们属于“一个流汗的阶级,为出版商和图书市场的暴政所束缚”<sup>[8]157</sup>。随着现代化市场的发展,艺术品和艺术家本人正在变为可供交换的商品,作家们和公众不再保持联系,而只能通过市场来接触到大众。销售成为作家和读者之间主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为了要取得和大众的联系,作家们被迫尽最大努力满足市场要求。有鉴于此,重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市场中对人的异化发起了批评。他们提倡传统社会的闲暇,向往文学自给自足的世界,认为文学创造性、自发性可以同资本主义的机械

化相对立。

相对于科学世界的抽象化,重农主义更加欣赏文学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1926年,兰色姆指出,“经验历史顺序中有三次运动,第一次是原初经验,是所有智慧的纯粹内容,没有反思,具体而单一”,而第二次运动是人之活动,在其中“其记录来自于第一次运动”;认知引向观念,而观念将抽象分为无意识和实践,因此,“经验成为历史,成为概念化的知识”<sup>[9]125</sup>。对于兰色姆而言,科学习惯同第二次运动相关,其动机是对行为目的的理性化理解。而第三次运动来临的原因是人们意识到第二次运动不可能完全知晓经验,科学世界和想象世界具有不同规律,而语言的诗性功能可以恢复世界的完整的本真状态。相对于科学的抽象和概念,兰色姆认为,“想象是纯记忆的机构,或源自无意识的头脑;它从黑暗的储藏室内带出了原初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想象时,我们在后退;我们正试图重建一份我们曾有过的经验”<sup>[9]125</sup>。我们很容易在新批评阶段兰色姆的著作中发现对这段重农主义时期话语的回应,在《诗歌:本体论札记》(1934)中,兰色姆提倡感性和理性结合,对于诗歌创作,他认为,“逼着我们去写诗歌、去考虑美的经历的是梦,是回忆……艺术是以第二次爱情,而不是以第一次爱情为基础的”<sup>[10]50</sup>。

可见,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的话语演变过程中,兰色姆等区分了科学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不同,进而推崇文学世界的本真性。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科学实证主义考据式研究,忽略了文学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避免文学作品沦为市场商品,从而避免工业资本主义的异化。重农主义话语通过文学和社会的互换,表达其政治诉求,认为文学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曾经感知的复杂世界的完整性,重新建立社会有机联系,修复曾有的创伤,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因而文学的有机统一间接批评了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残缺,以及市场价值和工业资本主义对人类精神的物化,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重农主义话语的社会政治诉求体现了新批评产生之前南方知识分子同社会话语的协商,预示着新批评从重农主义演变而来所具备的社会和历史视角。

## 二 一群预言家:激进的新批评

发表重农主义宣言之后,兰色姆等南方知识分子开始了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的话语演变。然而,这种演变并不是保守的后退,而是战略的转移。1930年,重农主义者发表《我要坚持我的立场》时,收获了上百篇评论,然而,在大萧条时代,它只售出了2174本,收入仅仅64714美元<sup>[11]69</sup>。重农主义者所嘲笑的市场价值颇具讽刺意味地颠倒了批评的对象。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

30年代后,美国的政治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重农主义者“恢复农业社会”的理想无法得到支持,同时他们也受到罗斯福新政的吸引。尽管他们意识到新政不能改变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他们却认为新政能接受一些非纯经济因素,如社会、文化等的影响。“新政期望建立一种稳定感,集体感,国家身份,这符合重农主义者的兴趣”<sup>[6]30</sup>。早在重农主义时期,他们就希望重建农业社会中 and 土地整体的和谐的联系,并认为,虽然诗人没有必要直接宣扬政治,但他们应该关注语言的活力,并用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来抵抗世俗社会非人性的一面<sup>[12]69</sup>。重农主义的这种观点在大萧条时期,转化成对政府的新政的期望。他们的政治理想体现为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塑造。就他们看来,文学能克服社会的混乱,重建社会秩序。

这段时期,重农主义者已相继离开了南方,在北方著名的大学任职。兰色姆离开了范得比而特大学,来到俄亥俄州的肯庸学院;泰特前往普林斯顿;沃伦去到明尼苏达州以及耶鲁大学。他们对当时文学研究的批评延续了重农主义时期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批评视角,他们对文学有机论的思索,也是南方叙事方式的再现。在新批评之前,文学研究主要采取传记式和印象式的方法,文学的意义存在于其历史的或现实的价值,文学的阐释依附于相应的历史对应物,如真实的史实,或作家的生平及个人经历。兰色姆等则将文本视作独立的客体,注重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割裂了文本的有机联系。这种对文本有机性的关注来自南方新批评家们传统的南方视角,它拒绝抽象的理解,而是尽力将不同的因素以“和谐”、“平衡”、“稳定”的关系放置于有机的思索中。因此格雷(Richard Gray)认为,兰色姆、泰特、沃伦等“从来没有停止根据南方代码来解读历史经历的冲动”<sup>[13]230</sup>。

对于泰特来说,传统是定义社会、文化中人们行动方式的一种典型符码。通过探究传统的不足,作家们可以批评其中的行为方式,并重建组织人们的社会联系。然而,这种通过艺术来改变社会的有效性取决于作家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泰特认为,法国等国家给予了作家极大的责任感和权威,而在美国,公众则“视作家为一个商人,因为[美国大众]不知道还有其他类型,也不知道对作家的成就表示尊敬”<sup>[6]48</sup>。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逐渐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金钱关系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产生的问题是,作家们被迫和公众生活分离,并只能通过市场来接触到大众。销售成为作家和读者之间最主要的社会交换模式。为了要取得和大众的联系,作家们被迫尽最大努力来满足市场要

求。新批评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以及文本中心的位置,从政治文化上来说,也是一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后者的意识形态所滋生的科学实证主义只是关心工具性,而忽视了真理和道德。因此,科学实证主义不能认识到它自身的局限,也不能欣赏诗歌中不理性的因素。作为新批评主将,泰特反对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将科学和文学分离的作法。泰特问道:“主体和语言难道不是同一的吗?”<sup>[10]130</sup>对于新批评家来说,阿诺德只是将语言看作了思想的工具,这意味着语言外在于文学;这种立场和科学实证主义相连,后者将文学联系看作陈述和意义的关系,而不是文学的语言和形式。

因此,南方知识分子从重农主义思想到实行新批评的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所持的是一种激进的文学态度。1940年,泰特和兰色姆等批评美国大学英文系对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缺乏兴趣。泰特其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程。他指出,创意写作不是教学生怎么样写,而是教他们判断文学的标准,教授学生怎么样去阅读和批评文学作品。兰色姆在《肯庸评论》中呼应泰特,他在《泰特先生和教授们》一文中指出,教授们应该告诉学生“艺术品的结构”<sup>[6]98</sup>。兰色姆、泰特、布鲁克斯等都呼吁更有活力的文学批评。在当时盛行的历史批评的背景下,新批评家们反对传统的“历史方法”(historical method)批评模式,认为这种批评模式是科学实证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延伸,没有考虑到文学生产过程。这群激进的新批评家们指责历史批评只是堆积历史信息,将文学贬低为史实的材料,成为“死去的躯体”<sup>[6]97</sup>,认为这种方法将文学、文化和社会作为事物的储存,而不是积极的再建过程。因此,在南方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新批评犹如凤凰重生般升起于范德比尔特的重农主义运动的废墟上”<sup>[13]210</sup>。新批评一时之间成为了大学校园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在《肯庸评论》和《南方评论》的推动下,美国大学中开展了系列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1936年,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沃伦和珀斯(John. T. Purser)一起,发表了《文学入门》(*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1938年,布鲁克斯和沃伦发表了重要的代表作《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1943年,布鲁克斯和沃伦发表了《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1949年,沃伦发表《现代修辞》(*Modern Rhetoric*)。这一系列新批评的代表作指示大学教师和学生,阅读诗歌应该关注文本本身,而不是将其视为作者自传,或历史思想的艺术表达,或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或从其他文本“外部”因素来阐释。兰色姆的“本体论”、泰特的“张力论”以及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内部论”,一时之间使持新批评

论者成为大学校园内的“激进分子”。然而,在社会意义上,“新批评是一项有挑战意义的文化政治运动”<sup>[6]13</sup>。套用Jr.鲁宾(Louis D. Rubin, Jr.)的评价,这些新批评者是“一群预言家”,他们即将占领美国大学教坛数十年,并奠定了诸多后来文学理论的基础。

### 三 新批评的传播和建构

重农主义者在学界重组英语教学的行动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而是带有政治动机的文化批评行为。由于战后社会闲置人员的激增,美国大学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招生。高等学府成为吸纳失业人口、储备技术人才、减缓社会矛盾的有效工具。1935年,美国大学发起了关于文学教育功能的辩论。大众教育的膨胀和学术研究处于矛盾中。而新批评在文学研究上,能够提供解决课堂教学的实用方法,建立社会和学术规范之间的联系,解决学术纪律的矛盾,很快受到教育机构的认可,并得到推广。另外,新批评话语对个人谬误、感受谬误的驳斥,可以使不同背景的学生统一在权威的文本细读之下。作为稳定社会的文学批评理论,新批评话语不久就在大学教育中流通并得到承认,为四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挪用。

南方新批评者们认识到,依靠小规模的知识分子读者和大批没有组织的读者群,不可能有效并且连续地传播他们的观点。1937年,兰色姆来到肯庸大学后,建立了《肯庸评论》(*Kenyon Review*)。南方新批评者们依靠的杂志还有《新共和》(*New Republic*)、《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西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弗吉利亚每季评论》(*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等。南方新批评者们通过教学和创立刊物,推荐新批评的研究视角,树立了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等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这些杂志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新批评的拥护者,成为新批评文化运动的话语阵地,在建构新批评话语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南方新批评者们一系列的工作对推广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传统的英语文学教学认为现代文学还没有经历时间考验,没有显赫稳定的名声值得深入研究。针对这种看法,泰特指出:“过去的文学只能被视为现在的文学才能保持活力,或许我们应该说过去的文学活在现在的文学里,而不是其他地方:所有的文学都是现在的文学。”<sup>[8]97</sup>新批评的这种态度打破了传统的桎梏,否定了以时间和声名来衡量作品的作法,是一种颇具生命力的话语。1936年,泰特在MLA年会上发表了论文《现代诗人和常规》,讨论了现代形式的诗歌怎样被看作传统。泰特强调文学形式总是有历史特殊性的,

文学形式总是在特别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生产,过去的文学形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问题<sup>[6]76</sup>。因此泰特指出,传统主义不是重复过去的成规,因为这些习惯和惯例脱离了语境就不再具有生命力;而现代文学保持了一种批评和嘲讽的态度,和过去的形式相比,现代文学突出了当代社会的缺陷和局限。泰特的这种观点不仅说服了英语老师去理解现代诗歌形式的有效性,而且为理解文学以及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最佳的方式。

在这一届会议上,布鲁克斯和沃伦还发表了《现代诗歌的阅读》,区分了“正确的阅读”诗歌同“发自陈腐的反映和读者个人历史的误读”之间的区别<sup>[6]77</sup>。他们认为,诗歌总是交流的形式,是一种包含了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不能降为一种个人反应。批评家应该注意的是形成这些个人反应相关的语言过程。正是从这里出发,维姆萨特等才发展出“意图谬误”和“影响谬误”等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沃伦等并没有使诗歌和生产以及消费语境相脱离,而是提出要关注文学行为的特殊性,识别与文学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文本生成的过程。他们认为,由于现代世界的文化是混乱和不连贯的,现代诗人必须比前人更加努力地去采取新的诗歌形式。这种态度明确地将文学行为和其他社会语境相连,而不是如后人指责他们那样,脱离了社会历史联系。新批评意识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它不仅反映而且解读它的社会语境。

另外,学界对新批评的接受也是特定语境下的选择。20世纪四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微妙。40年代后半期,正当西欧世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引发了系列危机之时,美国却处于短暂的战争繁荣时期,但好景不长,很快美国国内出现了六次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民族矛盾的尖锐以及由于科学技术畸形的高速发展而产生了社会政治问题,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繁荣、文明的社会外衣遮掩不住病态的堕落。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左倾的政治观点极易引发自身的危险。新批评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既不是同情苏联社会主义的话语,又能表达出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为众多知识分子挪用。泰特在1949年为庞德(Ezra Pound)辩解的《诗人对谁负责?》中,宣称诗人不参加政治,甚至不对社会负责,“他只对他作为一个诗人应

当具备的德行负责”<sup>[10]468</sup>。这种态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中立的立场,甚至默许在文学的范围内,知识分子可以畅所欲言,表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主张。不仅如此,南方新批评家布鲁克斯在1946年发表的《新批评与传统学术研究》,在同当时的学院派争辩的同时,更指出了新批评和传统的学术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以及可以达到的“理想融合”,并且表明了新批评更为精确的地方<sup>[10]473</sup>。新批评对学院派的主动示好,是他们融入学院建设和学科教育的策略,容易为保守的学院派接受。而在1951年,布鲁克斯则旗帜鲜明地将新批评定义为“形式主义批评家”,突出了新批评对形式的喜好,对文本内部微观世界的关注,进一步摆脱了文学和政治的直接联系,从而为知识分子畅通言路提供了方便。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新批评是在北美文学批评竭力走向‘专业化’、竭力成为一门可接受的体面学科的年代中发展起来的。……而随着40年代和50年代的来临,这一反叛者又很快被现存学术权力当局所同化。”<sup>[14]48</sup>新批评的这种意识形态无疑受到美国国内知识分子的欢迎,成为20世纪50年代最为通行的话语。

综上所述,南方知识分子从重农主义运动到新批评,投入了具有挑战意义的文化政治运动。他们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策略在文学领域被再现为精英式独特的政治力量。这种文学话语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束缚、可以独立存在的审美经验,并通过学术机构的生产和推广,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富有教化功能的话语,并在美国大学课堂里培养了大批后继者。他们的话语参与了社会能量的循环,通过南北意识形态对抗、新南方主义和进步运动、凯恩斯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美国大学教育改革、麦卡锡主义等话语链上的流通,推崇文学的自体地位,使文学独立于政治经济,成为知识分子追求和谐统一的政治诉求在现实中的投影,从而消减了社会矛盾,维护了国家权力。尽管新批评在后期逐渐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批评,但正如列垂起亚(Lentricchia)所言,新批评“死时的形象仍然是一位庄严的,强权的父亲形象”<sup>[6]137</sup>。正是在和新批评的对抗中,当代批评的身份才得以建立。对新批评的解读并没有终止,它的生命力将会在后来的批评中坚持并延续。

#### 参考文献:

-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2]RUBIN, Louis Decimus, Jr. *The Wary Fugitives: Four Poets and the South*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REED, John Shelton. For Dixieland: The Sectionalism of I'll Take My Stand[M]//HARVARD, William C. SULLI-

VAN, Walter, eds. *A Band of Prophets: The Vanderbilt Agrarians after Fifty Years*.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4]The Twelve Southerners. *I'll Take My Stand* [M]. New York: Harper&Row, 1962.

[5]约翰·克罗·兰色姆. 新批评[M]. 王腊宝, 张哲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6]JANCOVICH, Mar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New Criticism*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7]DAVIDSON, Donald. *The Attack on Leviathan: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M]//O'BRIEN, Michael. *The Idea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20 — 1941*.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8]TATE, Allen. *Memoirs and Opinions 1926 — 1974* [M]. Chicago: Chicago UP, 1975.

[9]O'BRIEN, Michael. *The Idea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20 — 1941*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赵毅衡(编选). “新批评”文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1]CONKIN, Paul K. *The Southern Agrarians* [M].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12]KING, Richard H. *A Souther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30 — 1955* [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GRAY, Richard. *Writing the South: Ideas of an American Reg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From Agrarianism to the New Criticism: Discours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Southern Intellectuals

WANG 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discourse 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studies, the discourse evolution from agrarianism to the new criticism foregrounds American Southern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strategies. Stemmed from the southern traumatic historical memory, this group of Southern intellectuals takes a retrospect to the past, advocates Agrarianism and the corresponded living style, protests against social invasion of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also against the deterioration of tradition and social order prompted by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agrarianists' political pursuit is expressed in their literary discourse and later represented by the new criticism's political ideal. The new criticism applies an ultimate and autonomic aesthetic experience, being produced and spread by academic institution; and finally this school of thought is absorbed into the main stream for cultivation. This discourse evolution contains the southern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ursuit and disproves the criticism which wrongly rebukes the new criticism's lack of historical point-of-view, ignoranc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American southern; traumatic memory; political pursuit; the agrarianism; the new criticism

[责任编辑: 唐 普]